

解放初期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甘南藏区的运用

(内容提要)

一、历史和现实的需要

- (一) 民族之间隔阂很深
- (二) 封建割据统治严密
- (三) 多种经济形态并存
- (四) 旧统治体制依然存在
- (五) 基层政权多未建立
- (六) 党的力量非常薄弱
- (七) 剿灭匪患的需要

二、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所决定

- (一) 建党初期党就提出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
- (二) 红军长征时期实践总结和制订了一系列民族统战政策
- (三)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成功地运用并确立了党的统战政策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
- (四) 全国解放后党继续坚持运用统战政策进行革命和建设

三、党在甘南藏区实行的民族统战政策

- (一) 大量团结和使用民族中上层人士
- (二) 充分发挥统战人士的作用
 - 1、尊重他们的意愿
 - 2、注意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 (三) 积极争取和教育统战对象
- (四) 做好群众工作、巩固统一战线
 - 1、采取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
 - 2、发放救济粮款、帮助贫苦群众
 - 3、派出医疗机构、解除群众的疾苦
- (五) 调解各种矛盾、维护统一战线

解放初期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甘南藏区的运用

白全忠

今年7月1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日，在这举国欢庆的时刻里，我们回顾党在甘肃甘南藏区走过的光辉里程，总结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开辟甘南地区工作阶段的基本经验，弘扬党在领导甘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中的斗争艺术，是很有意义和裨益的。它对于现在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我们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的统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共同促进我国的“四化”建设，将会起到借鉴的作用。

1949年下半年，甘南地区的夏河、临潭、卓尼三县相继解放至1956年，是我们党开辟甘南藏区工作的阶段。那时的甘南地区社会矛盾尖锐、民族关系复杂，政治、经济、文化落后、问题成堆。如何在甘南藏区这个极其复杂的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并进一步开展工作，是我们党面临的现实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正是由于我们党抓住了甘南的主要矛盾，提出并实践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即从甘南藏区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大力宣传和落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确定的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同时，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正确制定和坚决实施了一条对甘南民族宗教代表人物实行“争取、团结、教育”和“长期合作”的方针，因而迅速打开了甘南地区的工作局面。这条方针的实行，广泛争取和团结了本地各族各界中上层人士，逐步消除了他们对我们党的怀疑和顾虑，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剿灭匪特、安定社会秩序、进行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及民主改革等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工作实践中逐步改造思想、提高觉悟、与党同心同德，振奋精神，在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

下面我就当时在甘南藏区实行这条统一战线政策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正确性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阐述：

一、历史和现实的需要

甘南藏区位于甘肃西南部，是个以藏族为主体的汉、回等多民族聚居区。解放初期总人口为29.73万，其中藏族有15万，约占总人口的51%，加上回族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的60%。

(一) 民族之间隔阂很深

解放前，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对我国少数民族实行的是“俾沫汉化”、“以夷治夷”的政策，采取的是同化、分裂、掠夺、镇压和欺骗的手段，尤其是国民党政府和甘、青地方军阀马麒、马麟、鲁大昌的野蛮统治和血腥镇压，使得甘南藏区这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处于人丁不旺、生产落后、交通闭塞，政治、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的状态。他们不但多次出兵，用武力镇压藏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大量残杀无辜群众，而且极力挑动甘南地区各民族之间和藏族内部的矛盾冲突。在他们的挑唆下，民族之间积怨很深，时常处于剑拔弩张之势，藏族内部也经常发生仇杀械斗事件。一次次血的教训，造成了甘南藏族人民对异族的多疑和戒备，这种心理状态，给解放后我们党在甘南开辟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二）封建割据统治严密

解放前，甘南实行的是土司制和喇嘛教寺院“政教合一”的政治统治体制，即大小土司和各寺院中的大小活佛几乎统治着整个甘南地区。自明、清以来，土司中最大的是卓尼的杨土司，已沿袭了20代。他的辖区包括现在的卓尼县全境和迭部、舟曲两县的南半部，人口约10万左右。在辖区土司是政治、军事、宗教的最高首领，他和他的土司衙门内的官员以及基层组织16掌朵和48旗的各级首领，构成了这个封建小王国的严密统治网。在喇嘛教寺院中，自清朝以来兴起的夏河拉卜楞寺院，是统治甘南地区的另一个政治、宗教和经济集团。它的势力范围不但遍及现夏河、碌曲、玛曲三县的广大农牧地区、而且远及青海东部和四川北部地区。它对上述地区的统治是通过它和下属的108个寺院进行的，这些寺院遍布甘、青、川的各个角落，形成了一个以寺院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统治网。夏河拉卜楞寺院的嘉木活佛是整个拉卜楞教区的最高统治者。在教区内，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行政、外交、司法、文化等活动，都由他和他的高级僧侣、高级官员以及属寺的寺主掌管。甘南藏区当时除上述两大势力派外，还有许多封建割据的小土司、千户、僧网、土官等，他们都各自为政、称雄一方。以上这些统治者，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封建特权，决定和掌握了占人口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命运，他们的意志，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本地区、本部落的民愿，因而他们的人心向背，也决定着这些地区人民群众的人心向背。从历史上看，甘南藏区一直被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所唾涎，他们都想涉足统治。这期间，国民党政府曾任命卓尼土司杨积庆为“洮岷路游击司令”等职，也曾委任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洋之兄黄正清为“番兵游击司令”等职，尽管国民党在卓尼、夏河曾设立了设治局、县政府，但其权力小得根本不足以与卓尼土司衙门和拉卜楞寺院相抗衡，几度“改土归流”均遇失败，最后他们还是未能实现控制这些地区的目的，更没能动摇甘南地区的基本统治体制。解放后，我们党正是根据甘南藏区的这种特殊情况，决定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来打开全局工作局面的。

（三）多种经济形态并存

甘南地处僻远，疆域辽阔，由于历史的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原因，使这块地方成为一个既有农区和半农半牧区，也有牧区的三种政治经济形态并存的地区。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黑暗统治和残酷的剥削压榨，使得这里的交通极为不便，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发展很缓慢。尤其是偏远的广大牧区、信息更加闭塞，群众过着几乎与外界隔

绝的生活，这就造成了群众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的愚昧落后。因此，他们因循守旧，不易接受新事物，而又容易受匪特挑唆。这种状况，就决定了解放后党在这里开辟工作的难度和进行统战工作的必要性。

以上种种情况，就形成了解放前期甘南藏区境内多种政治、经济形态并存的特殊现象。

（四）旧统治体制依然存在

1949年下半年，甘南各县相继解放。随着解放，虽然国民党旧政权在各县的统治机构被砸烂和消灭，但土司制和“政教合一”的寺院统治体制依然存在。尽管1950年卓尼的杨土司顺应历史、公开宣布取消了土司制，但实际上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统治和群众的思想并没有马上发生变化。所以，当时民族宗教人士的作用，仍显得特别重要。

（五）基层政权多未建立

解放初期，我们党虽然在夏河、卓尼、临潭三县建立了县级政权和分区、乡级政权，但在广大牧区及偏远地区大多尚未能建立起基层政权，党的工作甚至没能远及到这里。这里的群众对共产党和党的各项政策，几乎可以说是根本不了解，而对历史上异族入侵给他们造成的心灵上和精神上的创伤却历历在目。在他们心中，只有活佛、土司、土官、头人，而根本不会马上直接接受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因而，在当时离开当地民族代表人物的合作，是很难在这些地区开展工作的。

（六）党的力量非常薄弱

1949年解放时，甘南藏区只有2个共产党员，民族干部也非常少，仅有17人。就是到1953年甘南藏族自治州建立时，在1,689名干部中，少数民族干部也只有319名，只占干部总数的18.8%。当时，在甘南开辟工作的，绝大多数都是从内地来的汉族干部，其中一部分是解放时随军来的，一部分是1950年和1952年中央访问团和西北藏区访问团来甘南访问时留下的。在广大的偏远牧区和边远山区几乎没有培养出一个党的干部，甚至劳动人民中也没有一个靠拢人民政府的积极分子。这就决定了要开辟这些地区的工作，必要依靠当地的民族各界声望人士。

（七）剿灭匪患的需要

1949年随着全国各地的解放，一大批从内地及各地逃亡来的国民党残兵败勇、地痞流氓、恶霸地主等聚集在甘南这个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它们狼狈为奸，纠合成一股股反革命匪帮。据统计，1952年上半年，窜扰在甘南境内的就有以马良股匪为首的21股武装匪特。它们到处烧杀抢掠、大肆造谣惑众，蒙蔽和拉拢藏区各地一些不明真象的头人和群众，煽动暴乱，袭击我们党刚刚建立的基层人民政权，妄图在甘、青、川交界的广大藏区建立“反共陆上基地”。一时间，甘南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广大藏区人心不安。面对当时的情况，我们党要在甘南藏区巩固和建立政权，要争取群众、孤立和歼灭匪特，就必须依靠民族中上层人士来做群众的工作。

综上所述，解放初期，甘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情等各方面的条件，都决定了我们党要在甘南地区站稳脚跟，并进一步开展工作，必须首先抓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教育”民族宗教代表人士和我们党一道来打开甘南工作的局面。

二、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所决定

解放后，我们党在开辟甘南藏区的工作时，为什么首先要选用统一战线这个武器，而没有采取其它形式呢？除了甘南地区特殊的历史环境所决定之外，我以为这也是我们党长期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所决定的。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正是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这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是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我国运用，也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从领导中国革命中总结出来的革命理论。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1926年，毛泽东同志就在他所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阐述了这样的思想。他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这里所讲的“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就是指建立革命大众的统一战线。这是我们党早期提出的统战思想。

在红军长征时期，沿途经过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在处理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中，我们党认识到了建立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明确提出了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如刘伯承同志与彝族小首领小叶丹的“歃血盟誓”，就是我党开展民族统战工作的典型例证。此后，红军进入川西北后，在同少数民族的频繁接触中，在建立川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在筹粮扩红过程中，总结和制订了一系列关于少数民族的方针政策，并且特别注意贯彻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从1935年8月党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及以后的文件中就可以看出。它指出：“在民族运动中有革命意义的土司、头人、喇嘛，我们仍然不放弃与之联合或使之中立。”总之，红军长征时期，确立了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革命阶段的重要位置。

1935年，全国抗战前夕。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说：“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反日全国统一战线的思想，我们党在1936年，成功地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局面。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他写的文章《〈共产党〉发刊词》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十八年的斗争经验，明确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党三个主要法宝的论点，因而正式确立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在革命三大法宝中的首要地位。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配合武装斗争和建党工作，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因而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1949年9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大政大纲。这次会议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

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力量的空前大团结，也表明了党的统一战线在新中国建立后的重要地位及我们党继续开展统战工作的决心。1949年11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给西北局和甘肃省委的电报中，对于解放后我们党继续开展民族统战工作，又作了明确的指示，电文中说：“据青海省委迭次反映，马匪（指马步芳——编者注）余党在许多地方煽动群众组织反抗，此次兰州会议上请予以严重注视。除大力剿匪，省、地、县委集中注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民参加政府工作，在日前时期，一律照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注①）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这一指示，正是甘南藏区解放后，我党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开辟甘南工作的依据。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全国解放后党关于统一战线思想的进一步确立，甘南藏区解放初期的实际情况，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在开辟甘南地区工作时，必定会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武器。

三、党在甘南藏区实行的民族统战政策

1949年甘南解放后，我们党从各县政权机构筹建起，就根据我党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精神和西北局制定的对民族统战人士实行“争取、团结、教育”的方针，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当时的夏河、卓尼、临潭三县都普遍争取和吸收了各方面的民族代表人物参加了县级人民政权机关的工作。之后，随着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和基层人民政权的不断扩大，一大批民族代表人物又陆续进入了参政、议政组织。统战工作中，我们党努力使被统战人士有职有权，扶持他们工作、关心他们的进步，在生活上优待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帮助他们在工作中做出成绩。这样做的结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程度不同的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工作上得到了进步，并在他们之中培养出一大批能够和我们党长期合作、与党同心同德，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士，使他们在开辟甘南、建设甘南的事业中不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大量团结和使用民族中上层人士

解放初期，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指导方针是：“依据民族政策，以民族团结为中心，慎重稳进，在民族地区组成较一般地区更广泛的以民族工作为主要内容和通过民族形式的统一战线。”（注②）根据这个方针，除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外，我们党对甘南各民族、各阶级、阶层的领袖人物和宗教界的中上层人士等一切愿意或暂时还愿意和我们党合作的民族代表人物，都加以争取、团结和使用。首先安插使用了在甘南藏区各县影响很大，声望很高的民族宗教界代表人物，如夏河县的黄正清（在省上安排了职务）、黄祥、达尔吉、贡唐仓等，卓尼县的杨复兴、杨景华、杨国华、雷兆祥等，临潭县的丁立夫、马国璋、马富春等。之后，随着工作的开展，又遵循“可争取者一定争取，可安插者一定要安插，可改造者必须要改造教育”的原则，（注③）又陆续将一大批民族人士、知识分子和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安插到各级政权和协商组织担任领导工作。1950年仅卓尼行政委员会成立时，在19名委员中，藏族中上层就占了16名。1953年10月，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府和政协成立时，藏族代表各占了代表总数的60%，有9名民族领袖人物，参加了自治区机关的领导工作，占区级领导干部的85%。到1954年，全区

已有159名民族中上层人士被安排到区以上各类领导机构担任了领导工作。当时，甘南各县的正、副县长绝大多数都是民族代表人士。

（二）充分发挥民族统战人士的作用

解放后，党在注意大量团结、使用统战人士的同时，还注意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一方面让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参政议政，充分发表对各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尊重他们的意愿。一方面放手让他们去工作，尊重他们的职权，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鼓励他们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去宣传群众、争取群众。

1、尊重他们的意愿

长期以来，甘南就是一个与外界封闭隔离、封建割据、保土自守的地方，佛教寺院通过宗教的严密控制和地方封建头领的世袭统治，使得占这里人口大多数的藏族人民，只信活佛不信皇帝，只信土官头人不信政府。因此，解放初期，党在甘南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对各阶层民族宗教人士的工作，只要这些人的工作做好了，甘南的工作也就好做得多了。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党在开展工作时，主要采取的是通过上层协商办事的方法，即一切事情都先与当地中上层人士商量，商量好的就办，没商量好的就缓办，直至协商好了再办。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党在进行各项工作前，都首先与民族领袖人物磋商，或召开各种会议，或个别征求意见，并注意尊重他们的意愿，因而逐步取得了他们对党的信任，调动了他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为开辟甘南做出了贡献。如夏河县在解放后的三年中，为了建政、剿匪、恢复和发展生产等工作，就召开过各种民族统战会议达26次之多。甘南临时工委仅1952年在夏河召开过的大型会议就有甘南各族各界代表会议，阿訇头人座谈会，十二部落头人座谈会、讲习会，甘南各族各界联谊会等多种会议。通过这些会议，不但反复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各种上会政策，使与会者接受了党的教育，而且通过参政议政，在与党和政府的接触和切磋中，也使他们逐步改变了对党的看法，转而接近党、支持党的工作，因而达到了与他们沟通思想、联络感情，动员他们为开辟甘南做贡献的目的。再如：1952年，马良股匪在甘南藏区活动猖獗，他们纠集了解放后从各地逃窜来甘南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地主恶霸，各种反革命分子，组织了二千多人的庞大股匪，到处烧杀抢掠，袭击我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杀害我政府工作人员，大肆造谣诬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蒙蔽欺骗了甘南藏区一批不明真象的群众，使边远牧区、山区的不少头人和群众参匪援匪，武装对抗人民政府。针对这种情况，甘南临时工委多次召开会议、反复向各界人士宣传党的政策，揭穿匪特的谣言，使他们看清了匪特的罪恶用心。因而，当我党讨论剿灭马良股匪的问题时，代表们都踊跃发言，坚决支持我党尽快剿匪。夏河、临潭、卓尼三县的许多代表请愿说：藏区有匪特作乱，就象火烧在我们身上一样。因此，我们迫切要求政府尽快出兵剿灭匪特。后来的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党重视了统战工作，调动了统战人士的积极性，因此，在我军进剿马良股匪时，甘南各界领袖人物和许多地区的中下层头人，都以不同方式有力地支援了剿匪斗争，使我党在短期内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2、注意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当时，对已经参加各级政权机构和协商组织的民族领袖人物和各界声望人士，我们党不但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该看的文件叫他们看，该听的报告叫他们听，该参加的会议请他们参加，组织他们学习党的各种政策，在生活上给予他们比同级干部优越的条件。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尊重他们的职权，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在处理各种问题上，特别是在处理民族内部和寺院内部的问题上，多依靠他们，尊重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出头露面，挑重担。如在1953年的剿匪中，我们党安排了在甘南藏区声望很高的民族领袖人物黄正清、杨复兴、黄祥在甘南剿匪委员会中担任领导职务，就发挥了他们的积极作用。如黄正清自从担任甘南剿匪委员会主任兼甘青剿匪指挥部副司令员后，工作热情很高。他随同“剿指”进驻郎木寺地区后，就积极召集各部落、各寺院的土官、活佛，向他们反复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剿匪政策，号召各地的头人和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支援解放军剿匪。在他的感召下，藏区各部落纷纷与马良股匪断绝了来往，并以各种形式支援了剿匪斗争。再如：1953年底，当甘南全区性的铲烟、禁烟运动即将开始前，甘南自治区副主席黄祥亲自带领一个工作组，深入到夏河县下巴沟一带，动员宣传群众彻底铲除了烟苗，为甘南的禁烟运动树立了榜样，因此，我们党在1954年成功地铲除了鸦片烟苗约三万亩。

（三）积极争取和教育统战对象

甘南藏区人民，有史以来就受到外族的压迫、剥削和欺骗，加之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这里的人民对外界事物稀闻罕见，因此，许多地区的群众和头人对异族多存疑虑、戒备。这种情况决定了解放后我们党要在甘南站稳脚跟并开展工作，就必须争取和教育群众，首先是教育那些与群众有直接关系，掌握群众的民族中上层人士。针对这种情况，解放后我们党通过各种方式向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宣传党的各种政策，并以党的干部的身体力行感化他们之外，还通过多次组织参观团、访问团赴祖国各地参观访问来教育他们，仅甘南解放至1954年，夏河一个县组织的参观访问就达6次，共60余人，卓尼县在解放初的5年中，就有一百多人外出参观访问。代表团的成员中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占了大多数，他们通过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参观访问，通过亲耳聆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教诲，亲眼目睹社会主义新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相处的情形和祖国伟大的建设成就，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对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信任，参观团每到一处受到的热情款待和尊重，使他们更加相信党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政策。尤其当甘南牧区参观团参观了内蒙古后，对他们感触更深，那儿的蒙族兄弟在党的领导下，正热情高昂地建设着自己的新牧区，到处是一片人畜兴旺、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新景象，使参观者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正如夏河县的团员贡去乎所说：“我们以前对汉族总不放心，这次看了内蒙古和各大城市，才知道过去的想法是旧思想。今天毛主席派来的干部和旧社会不同，是真心来帮助我们的。我回去后要欢迎他们来帮助我们。”当时，卓尼县上层人士杨景华参加赴朝慰问团回来后，工作、学习比以前更积极。一方面在收到马良匪首的策反信后，立场坚定不动摇，正气凛然地复信规劝匪徒们放下武器向人民政府投降。一方面努力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沿途参观的所见所闻、鼓励和教育群众靠拢人民政府和匪徒划清界线，做坚决的斗争。在他的影响下，今选部县电泉

寺的寺主，在众匪包围了寺院、在匪徒刀枪的威逼下，不但断然拒绝了匪徒们叫他带领当地藏族群众参匪的要求，还痛斥群匪、号召群众赶走了匪徒。总之，通过参观访问，不但教育和争取了绝大多数民族中上层人士，而且通过他们也为党争取了大量群众。

（四）做好群众工作，巩固统一战线

在甘南，做好统战工作是开展群众工作的基础，而做好群众工作，彻底解放各族人民，才是我们党的目的。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几十年的浴血奋战，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拯救中国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就是为了让他们永远摆脱剥削和压迫，摆脱贫困和落后，过上自己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因此，只有广大群众起来了，生产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树立了，才能有力地巩固党的统一战线。为此，解放初期，党在甘南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群众觉悟很低的少数民族地区曾做过大量而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采取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

一是通过召开会议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政策。解放后，我们党曾在甘南各县召开过多次老人座谈会、农牧民座谈会。1950年和1952年中央和西北访问团来甘南时也曾利用召开群众大会的机会，向群众直接宣讲党的政策。二是通过民族中上层人士向群众宣传政策。解放后，在每次重大的运动中，诸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剿匪、禁烟等运动中，我们党都向基层派过大量的工作团、工作组，在这些团、组中都吸收了很多民族宗教人士参加，通过他们向群众做过大量的宣传工作。三是通过党的干部的模范行动向群众宣传政策。如1953年剿灭马良股匪期间，甘南工委曾组织了甘南藏区工作团和军政联合的武工队。他们深入基层后，采取召集群众看电影、给群众治病、主动帮助群众修复寺院、平整土地、与群众交朋友等方法，接近群众，感化群众，然后采取个别交谈，召开会议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发放救济粮款，帮助贫苦群众

解放后，为了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帮助甘南藏区人民克服生活上、生产上的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国家很困难的情况下，曾多次拨出巨额款项帮助群众。1951年共发出各种贷款144,900元，1952年230,000元，1953至54年6月，又拨出423,000元。另外，1953年还发放救济款50,000多元。从1954年下半年起，党和人民政府又增加了对甘南的拨款，在至1956年的二年多的时间内，光为了发展畜牧业生产就拨款829,637元，为了救济贫苦牧民建家立业，又拨款868,690元。

3、派出医疗机构，解除群众的疾苦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甘南藏区各族人民的身心健康，为了解除甘南广大群众的疾病痛苦，改变历史遗留下来的甘南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曾多次派出医疗队和大批医务工作者来甘南工作，并帮助建立了州、县医疗机构。1953年中央医疗队和省性病防治队就来到了甘南。他们走乡串户为群众医治疾病，解除痛苦。截止1956年，已为各族群众治疗达到406,639人次，其中免费治疗就有155,310人次。他们挽救了许多群众的生命，被藏族人民亲切地称为“毛主席派来的救命恩人。”

（五）调解各种矛盾，维护统一战线

解放前，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蓄意在甘南藏区各民族之间和藏族内部制造种种矛盾，挑起种种纠纷。一次又一次地互相械斗残杀，不但使许多无辜群众成为他们的牺牲品，而且造成了各少数民族对汉族、各少数民族间、部落间、教派间很深的隔阂和积怨。民族领袖人物间也是互相猜测、互相戒备、互相不信任。因而，草山纠纷、林权纠纷、争夺教权、争夺群众等大量的矛盾和纠纷就成为我们党解放后进行民族工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巨大阻力和障碍。面对解放后甘南的现状，在党中央西北局和省委的领导下，甘南各级党委把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批判大汉族主义，调解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矛盾纠纷，安定社会秩序，增进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工作，摆在了民族工作的显要地位，进行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工作，1949年11月8日，成立了夏河县民族事务委员会，随后卓尼、临潭二县民委也相继成立，专门负责调解和处理民族事务中的问题，并集中力量，批判了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从1950年起，省上专门抽调了一批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夏河、卓尼等地宣传政策，调解各类纠纷。当年12月，在西北民委和甘肃、青海两省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在夏河、同仁两县民族人士的配合下，成功地调处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长达200多年的夏河县甘加部落和青海同仁县甲吾部落之间的草山纠纷，使这两个部落的人民化仇为友，和睦相处，生产不断发展，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新生活。1953年底到1954年，甘南各县针对各族干部间存在的一些不团结现象，普遍检查了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又一次纠正了存在于一部分外来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同时也指出了地方民族主义的危害性，因而增强了外来汉族干部和当地各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1954年9月，在中央和甘、川两省政府的关怀下，现甘南玛曲县齐哈玛部落与四川某部落发生械斗时被赶出原居住地的1,200多名群众，随着草原边界纠纷的处理，得到了妥善安排。到1954年底，我们党共调处了州内外各种纠纷达2,800多件，有力地安定了藏区的社会秩序，加强了民族和民族内部的团结，促进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藏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我党进一步开辟藏区工作创造了条件。

在调处各种纠纷，维护统一战线工作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要求各界人士无论在那儿发生事情，都要先向当地党委汇报，由党委会研究作出解决矛盾的方针政策，然后委托统战人士或交由地方政府酌情处理，在处理过程中，我党时常听取和了解处理的情况，及时作出各种指示。在调处各种纠纷中，我们党还坚持了“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如：在解决草山边界纠纷中，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促进生产发展为宗旨，本着实事求是和互谅互让，不纠缠历史的精神；坚持“充分协商，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原则。解决的方法是参照旧礼旧规，依靠民族代表人士适当解决问题。在处理宗教各教派之间的矛盾时，我们党既关心矛盾的处理，又站在矛盾之外，本着沟通政策思想，调和派别矛盾、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一视同仁、个别说服，疏通矛盾，协商解决的作法，因而缓和解决了不少派别斗争。如：1952年，我们党通过积极、主动耐心的工作，缓解了夏河寺院以阿莽仓和火尔藏仓为首的两个宗教集团的矛盾。以团结、协商的方法说服了该寺活佛唐仓，接受了我党西南区的任命，参加了西川的政权

工作，保持了进步上层的地位。另外，我们党还在临潭县伊斯兰教的新教和老教之间进行工作，也逐步消除了两派之间的历史上存在的矛盾。

总之，解放后，我们党通过调解各种矛盾，改善和加强了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缓和了宗教派别间的矛盾，安定了甘南秩序。发展了生产，也有力地巩固了党的统一战线。同时，也促进了基层政权的建设。如，在夏河寺院阿莽仓的帮助下，我党在过去难以开展工作的夏河县阿木去乎部落，建立了区、乡级政权，后又在上层人士黄正清的帮助下，巩固了这里的政权。另外，在调处矛盾纠纷中，我们党也在群众中逐步树立了威信，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结束语：从五十年代上半期到今天，我们党又走过了三十几年的征程，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党虽然已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总结了许多成功的统战工作经验，但五十年代采取的与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和对民主人士“争取、团结、教育”的方针，现在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它是我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核心，在民族地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只有沿着这条成功的路走下去，我们党的事业才会更加兴旺，我们祖国各族人民才会更加团结、我们的“四化”大业才会早日实现。

甘南州委党史办

一九九一年五月七日

注释：

- ①、摘自甘肃省档案馆存档《毛主席对民族工作的指示》。
- ②、摘自甘南档案馆存甘南州委统战部卷《1953年统战工作总结》一文。
- ③、摘自甘南州委统战部卷《1954年上半年统战工作》一文。